

■新作聚焦

范稳长篇小说《碧色寨》一段被湮没的现代化历史

□贺绍俊

铁路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一项事业，我在读了范稳的《碧色寨》后，才知道中国人在上个世纪也曾因为铁路而引起世界的震撼，这就是修建穿越云南边境的滇越铁路。当时这条滇越铁路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列誉为世界三大工程。

碧色寨是滇越铁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车站，在范稳的描述中，可以想见当年这个车站非常繁华，也充满了异国的风情，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人都有身处巴黎的感觉。当然这个名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實在是太陌生了，我对它同样也感到陌生，在未读小说前，我还以为范稳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乡村的故事呢，但是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忽然对这种陌生感有了一种警惕。喜新厌旧似乎是人的天性，我们为京沪高铁上的风驰电掣而欢欣雀跃时，大概谁也不会联想起滇越铁路上曾经的辉煌吧。这二者之间相隔了太长的时间，人们不可能不把前者遗忘。所以我们可以将责任推给时间，时间是助长人们喜新厌旧的帮凶。范稳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时间其实是铁路带给我们的概念。在铁路到来之前，碧色寨的人们只有季节的概念，因此那位彝族最聪明的毕摩独鲁憎恨铁路，他留恋在季节中的生活，“季节让我们在一年中悠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间则让我们像猴子一样在大地上忙来窜去”。毕摩独鲁始终在与铁路作战，但人们都被铁路带来的新生活所俘虏，所以这是毕摩独鲁一个人的战争。或许我们即使坐在京沪高铁舒适的车厢里，也应该怀念这位曾与铁路作战的失败者毕摩独鲁，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曾经作为世界三大工程之一的滇越铁路的陌生感，其危险性就在那里。范稳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所以他坚持要以“碧色寨”为书名，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书名丝毫没有市场的

■看小说

龙一：《恭贺新禧》龙一的价值

电视剧《潜伏》之后，龙一成了出版界和影视界炙手可热的名字，而基于他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的讨论却并不多见。实际上，龙一的文学价值在于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塑造了“文学新人”，创建了新的人物关系，从而也推动了历史观的革新：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书写历史；理解历史即理解人性；理解命运；信仰不止是抽象的精神，更是具体的现实。同时，信仰也是一种命运，它充满了偶然和必然，充满了日常和非常，充满了智力和耐力。而革命者亦如是，他们不是“高大全”的牺牲者，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富有超常耐力的小人物。“革命也是请客吃饭”恐怕是龙一对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龙一的新作《恭贺新禧》(《人民文学》2011年第8期)写的是1936年春节前，地下工作者郑三泰带着烈士遗孤回天津，为筹建建立交通站的经费与走私、暗杀扯上了瓜葛，女儿被迫做人质。杀手“二饼”令人闻风丧胆，但郑三泰却不得不一边和他同心协力，一边与他斗智斗勇。刀尖上行走的胆战心惊和庆祝新年的波澜不惊，与被迫离婚的难言之隐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地下斗争的浪花云朵。所有的元素，包括情节、故事、语言、讲故事的节奏都很龙一，惟一不同的，龙一又一次塑造了一个具有新的人格元素的女性——女儿郑娟娘，12岁的她机灵、世故、善良、狡黠。她完全可以和《潜伏》中的翠平、《枪枪》中的裴艳玲共同构成龙一塑造的人物系列，女性在残酷斗争的方方面面、在非日常生活中日常智慧被龙一一一发掘，读来令人难忘。如今，一部小说能够塑造一个令人难忘的性格，多么难得。

朱晓琳：《诺曼底彩虹》文学与现实

文学反映现实是常识，但有很长时间，中国作家更多地琢磨“怎么写”，琢磨多了，“写什么”就成了问题。当下，文学与现实的隔膜问题，可以说是文学与普通读者的隔膜问题，似乎异常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说，朱晓琳的《诺曼底彩虹》(《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算是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探索。从朱晓琳的创作谈中可以看出，她写的也是自己熟悉的现实和人，但她在怎么写上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认知，她力图从更宽广的角度概括现实，概括人。寡母杨清芬女成文女，女儿高考落榜后她受人影响，以微薄收入送女儿出国留学，后来又不得不卖房子以供女儿之需。女儿和两个家里有权有钱的同学在法国过着被留学骗子蒙骗的生活，懵懂不知未来在何处，与此同时，妈妈则在国内节衣缩食，畅想着小儿贴着“海龟”的金回国之后的美好前程。原本这是一个盲目且缺乏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故事，却没有情感价值也缺少意义，但在有心的篇幅内，小说触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中介的问题，留学中介、房产中介；比如女儿的两个同学的家庭，以及背后所隐藏的中国社会深刻问题；比如杨清芬和小老板的关系所触及的深圳等级差异等等。尽管都是惊鸿一瞥，但使得整个小说富有生活的饱满充实。更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人都不是大恶大坏，但他们各有规则各有套路，贴近现实中人与人的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部中篇小说能做到如此，便算成功了。当然，作品人物性格的深入发展和立体化方面还有待加强。

(付艳霞)

■第一感受

重建身体与社会的关系

□李 洱

在阅读孙瑜的《空心床》的间隙，我看了张艺谋的影片《山楂树之恋》。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空心床》写的21世纪初的情爱生活，金钱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钱色交易无孔不入，主人公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浪迹天涯；而《山楂树之恋》则号称写的是纯情年代的爱情，据说这部影片还感动了无数的人，富丽堂皇的影院中甚至泣声阵阵。但奇怪的是，两相对比，我从孙瑜的文字当中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性，一张宽大的“空心床”实际上成了灵魂的校场，那种本来可能会有不良感觉反倒一扫而空，“窥视”变成了自审和他审，那些不安的隐隐作痛的灵魂借由孙瑜的文字令人惊叹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平台。

如果用通常的眼光看，《空心床》写到的那些情色生活、那些靠身体和脸蛋吃饭的人，似乎只是一些行尸走肉，与心灵毫不沾边，但是如果作家能够揭示出生活背后那个坚硬的逻辑，能够写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会走上一条如此险峻的道路：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写出他们真实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并以此呈现出他们与这个时代的复杂关系，那么它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一部可以引人深思的作品。事实上，《空心床》不仅对21世纪初的情爱生活的某一个侧面，给予了最为直接最为真实的描述，而且作者竭全力要对这种生活进行有力的反思。放眼望去，在欲望之海上漂浮的，全是一些挣扎的灵魂。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把《空心床》与所谓的“私人化小说”、“下半身写作”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私人化小说”和“下半身写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行其道，引来无数数点，但同时在批评界遭致非议。就我的记忆所及，其中最重要的指责，是说这种写作剥离了小说与公共性的关系，是因私废公。这样一种指

■短 评

理性通达的散文之美

□天 乙

卜键浸淫古典文学多年，是古代戏曲和小说研究的专家，尤其精擅《红楼梦》《金瓶梅》。举手投足颇具旧式才子的古风，字里行间常见文学史的雅稚。

卜键散文的语言风格以韵律之美最为显著。文白夹杂，读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虽然整体的抒情风格含蓄而舒缓，但节奏的起伏赋予从容以动感，动静形成张力，很有些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美学效果。

卜键的文章有一种能力，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之处表达得意味深长而又通脱开朗。写特才傲物、命运多舛的老友：“他的确退了，且在退休时仍未解决正高职称问题。我为之长叹，在当今社会，教授、编审早不是‘罕物儿’了，晚近如我辈早已编在其列，而刘辉居然屈陷‘副册’。我深知这对一生争强好胜的他会有怎样的刺伤，即使会面，也绝口不提此类话题，如此一来二去，倒有些生分了。”朋友是一辈子的师，在漫长的交往中，各人的升降沉浮势必带来相对位置的变化，原本已习惯的顺序一旦被打打破，失衡与相应的尴尬便随之而来。个中微妙人人心中肚明，却是不能说、没法说的。这段文字却像聊家常一样兜了个底，虽有不忍，却无梗涩。能言且善言难言之隐，没有几分谄媚的襟抱是做不到的。

卜键为人刚劲干练，笑语朗朗，文字却颇为阴柔，多见泪水、羞涩、叹息等等女性化的元素。为弥留之际的老友揉背，会“泪水涌

种时间观是与现代性相悖的，就像铁路修到碧色寨，碧色寨必须采用西元的时间形式，毕摩独鲁深为时间形式的改变而恐慌，因为他发现，人们“被站台上的那个法国时钟里的两根棍子，不断像被鞭子抽打着那样满地乱跑，连自己的爹娘叫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像中国这样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带来了时间的恐慌，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觉悟到必须改革的知识精英之一，他就意识到了时间形式的改变将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他说过：“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现代性的时间观是一种递进的单行线，它指向未来，一去而不回头。现代性的时间观也是一种进步观，相信时间带来的是进步和发展，时间淘汰了落后与愚昧。法国人把火车开进碧色寨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包括那位心地善良的露易丝医生。铁路修到碧色寨后，把碧色寨变成了一个巴黎式的乐园，但是时间更像是一个魔术师，它使得“碧色寨的季节被打乱，时间被腰斩，人间的爱情结出错误的果实”，然后又让“大地重新归于宁静，万物依然按季节轮替，莺飞草长、春华秋实，错乱的时间重新归于有序”。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时间上的错误。弗朗索瓦曾得意地对普田虎士司说：我们要给你们重新安排时间，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最终也被时间算计了！

范稳在云南边地碧色寨发现了一段被湮没的铁路，这也是一段被湮没的现代化历史，它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何等的艰巨和曲折。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甬温线上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新闻，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联想：今天的高速铁路与范稳所描写的这段被湮没的滇越铁路是接轨的，虽然二者之间相距数十年，但时间仿佛停顿了数十年，这多像是范稳在小说结尾描写的一个场景：当最后一列火车即将从碧色寨驶出时，“空留下高傲的三面钟孤独地守望着早已流逝的时间”。尽管高速铁路成为今天现代化高速度的象征，但高铁上的追尾突然让飞速的时间停顿了下来，我们有必要回到碧色寨，去看看那段湮没的铁路，它会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在我们的时间形式中，有循环、有扭曲，有停顿，但它永远不会让我们回到从前。我们要感谢范稳，他再一次把碧色寨车站的汽笛拉响，让人们对那段被湮没的现代化不再陌生。甚至我想，如果甬温线上的高速列车在出发前听到了碧色寨车站的汽笛声，也许就不会发生追尾的灾难。

■重建身体与社会的关系

责，其合理性当然值得探讨，我觉得理论界可能有些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但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相当多的作品当中——不仅是在“私人化小说”和“下半身写作”那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将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割裂的倾向。作为一种文学现实，我们看到，性和身体在作品当中仿佛仅仅是一种个体事务，性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被缩减到最简单程度，由于身体同时成为叙事的起点和终点，所以叙事的逻辑关系也被取消了。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语境当中，这样一种写作仍然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因为语境的变化，对性和身体的书写确实需要做出相当大的调整。

在我看来，孙瑜写作的意义就在于，她试图重建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她把性的问题放在一个消费背景下的庞大的权力网络当中重新审视。在这里，性爱是需要资金的，性爱不仅仅是两具躯体之间的生理活动，它牵扯到权力网络当中的各种神经末梢，个人性与公共经验的二元对立通过一张床被打破了，性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在这里似乎可以相互置换。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带着各自的社会经验进入这个权力关系当中，因为权力的奴役似乎没有快感也要叫，又因为权力的奴役所以有了快感反而不敢轻易大叫。所以小说中存在的一个基本线索其实是快感在权力的奴役上是如何丧失的，它又是如何经由一条险峻的道路重新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感人的力量从小说中迸溅而出。

孙瑜本人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就我所知，她做过期货经纪人，做过记者和编辑，交友广泛，博览群书。她曾经深度潜入这个时代的主流和支流，并获得了相当深刻社会体验，所以她现在拿出这部作品，我一点都不吃惊。我期待她能够有更有力的作品面世。

一生不灭的追求理想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质，这固然与今天散文时代的生存环境时有格格不入，但却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底色和良心。我一直对这一代人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动荡总比安静能够挤出更多的人性，也会在人性中留下更多的脉络。他们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最全面也最深刻地展示动荡年代的风貌图景以及后续岁月的生命历程。

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卜键却是温和的。他的文字也经常提及过去的苦难，包括流离、饥饿、贫穷，却绝少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只是冷静的叙述，却自有重量。其中有宽容：“很久很久以后，我偶然还会忆起那场刻骨铭心的饿，还会寻思大伯为何不让我吃那些傻瓜和饼子。那是一个很多人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那年月最好的待客方式是拿出一些吃的，可你若真的吃了，主人就会有可能付出饿肚子的代价。当终于想明白后，我理解了大伯的仁厚与善良，也彻底化解了对他的误会。”有乐观：“记得曾用一元钱买了一支竹笛，临晚向月与小弟轮流吹起，吹的是《东方红》之类革命歌曲，算是一种乐趣。又有哪个时代能完全摒弃弃乐呢？”还有苦读者将苦难作为财富的骄傲……

这样的文字会让你相信，他一直就是这样平静地接受着，在不慌不忙中保持刚强。这种冷静应该与作者的职业与身份有关，但决不仅仅是身份决定论这么简单。深层原因是，这个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代表着社会的评价体系。理性、平衡、秩序是他们呈现给社会的整体面貌，并最终成为主流意识。转化为文字，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冷静和渗透纸背的力量感。

■创作谈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道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气候立体、地貌多样、文化多元的地方，那片地域与我熟悉的滇西北在民族文化、人文地理与历史等方面大相径庭。既然在藏区的写作已经到了某个阶段，我想，我需要一次转型，需要重新去发现并学习一种文化，或许会找到一条新路子。而且，我过去对红河州也并不陌生，只是没有深入地了解一下。

此行的目的是去探访一条百年的老铁路——滇越铁路。多年以来，许多云南人都在为这一条通往境外的铁路而自豪，它曾经带给这个边疆省份太多的温馨回忆与太多的陈年旧梦。在新中国的铁路交通已经进入高速时代的21世纪，上个世纪初在云南大地上奔跑的火车，似乎正承载着历史，向着最后的终点站——博物馆，缓慢驶去。久远的汽笛正在消散，蜿蜒在南国高原的铁轨正在慢慢锈蚀。真实可信的历史，就像一趟远去的火车，在人们的视线里日益模糊，越来越像一个传说，甚至越来越像一段传奇。

但这条由血和泪构筑起来的跨国铁路，那些被历史的烟尘湮没了的动人故事，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尽管滇越铁路于我来讲，并没有往昔岁月真实而亲切的记忆，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云南工作后，甚至也没有乘坐过一次滇越铁路线上的小火车，我只是多次远远地对它行注目礼，多次听到有关它的动人传说。但作为一个铁路职工子弟，我对铁路与火车同样有着某种血脉深处的认同感。我基本上算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我的父亲年轻时就修铁路（成渝铁路），童年和少年时期也干过不少爬火车的事儿，在睡梦中时常伴着火车的汽笛和震动。那种老式的蒸汽机火车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特别深刻，红色镶白边的钢铁车轮、巨大的动力臂、粗犷雄壮的轰鸣和吼叫，宛如在大地上奔跑着的无所不能的英雄。按现在的孩子们的眼光看，它就是那个年代的机器侠。我父亲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但他那种铁路人的自豪经常对我有些潜移默化影响。既然一个铁路人的后代当了一名作家，总得为铁路写点什么。尽管我父亲修的铁路和我现在写的铁路是多么不一样，但我还是想以这样一本书纪念他的在天之灵。

因此，这就像家族遗传中一件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从2009年起，我便计划写一部关于外国人在上个世纪初如何在云南修铁路的书。那时不要说边地云南，就是广袤的中国大地，都还处于一种蔽塞的、保守的、落后的甚至原始、荒荒的状态。那种社会形态在云南的民族地区体现得更为突出。但是，当一列具有浓郁殖民色彩的火车带着太多的血腥、疯狂的梦想、傲慢的姿态，猛然撞开僵化保守的大清帝国南大门时，古老的乡村不再淳朴宁静，沉睡的大地充满了喧嚣，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迫改变。这就像一个寓言，昭示着一个封建保守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在上个世纪初必须要承受的屈辱和苦难，必须要付出的昂贵学费和无数鲜活的生命。在边陲之地云南，这种代价或许更为惨痛，文明的反差更为巨大。

但我更关注一条在艰难环境中修建起来的国际铁路由此而带来的不同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那些来到东方的殖民者，他们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迎面相遇时，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命运，以及一个古老的民族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如何从仇视、反抗、拒绝到反思、学习、借鉴。我还想在这部书中表现出云南的另外一面：这就是它在上个世纪初的开化、现代和所体现出来的商业文明、物质力量。通常人们提到云南，总是将它同民族众多、风情奇异、原始古朴这样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或许没有想到，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初，在滇南一线，因为有了这条铁路，海关、邮局、电影、洋行、商号、股份制公司等以日进千金的工矿企业，已然代表了这片土地在历经磨难之后奋起直追的勇气和尊严。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云南的这一面并不为彩云之南以外的人们所知多少。

表现这一题材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殖民半殖民时期的文化，西方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看待中国的眼光，彝族这个古朴单纯的民族面对骤然开进来的火车的慌乱和阵痛、坚守和迷惘等等，这里面涉及的历史知识、民族学知识、宗教文化和地方志等方面的内容，都需要重新去学习认知。好在前人在此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关于滇越铁路修建过程中的一些史料也比较全面，彝族文化方面的书籍也很多，让我在写作中获益匪浅。尤为重要的是，滇越铁路虽然现在已经是一条被冷落的国际铁路，但它就像路旁一息生命余晖的老人，依然在寂寞地坚守自己的价值。我现在仍然能从铁路沿线繁华褪尽的法式火车站站房、小洋楼以及锈蚀的铁轨中，读出那个时代的辉煌，铁路在许多代人眼里，其实就是一个隐喻，它驶向未来，也回到过去；它也像时间纵向坐标上的一个活体标本、一笔沉重的历史遗产，延伸在五彩斑斓的大地。我相信，它不会就此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我从2009年开始阅读滇南各民族文化方面的书籍，同时走遍了滇南的十多个县，这是我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在大地上广泛汲取创作的源泉。在云南，不但它的气候是立体的，植被是立体的，地形是立体的，文化也是立体的。它常常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像个美人一样，嫣然展现出她风姿绰约、精美绝伦的天地大美。

我感到庆幸的是，到2010年底，终于完成了这部反映一条血泪铁路由盛到衰的历史和几个贸然闯进东方文明古国的西方人命运的小说。我把这部书取名为《碧色寨》，它似乎不是在一个足以夺人眼球的、具备畅销书要素的书名，但我并不在意。碧色寨是一个彝族村寨的名字，至今还在新中国的版图内，籍籍无名；碧色寨是从前滇越铁路线上一个特等大站的站名，一条法国人修的米轨铁路和一条中国人随后修造的寸轨铁路在此交会，但因为轨距不同而永不相通。它最初不过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寨，后来变成一个商贸云集、中西混杂、财富滚滚的流淌白银之地，又因为抗战的因素、时代的变迁，再度沦为一个个凋敝破败、寂寥冷清村寨。西方殖民者当年在这里寄托了太多的财富梦想、太多的爱恨恩怨、太多的悲欢离合。直到21世纪初，法国人还在回访这个遗世独立的车站，寻找他们的祖辈在遥远的东方留下的足迹。他们都不愿忘记，我们更应该铭记这段历史了。

□范 稳

190年的火车承载的历史与传奇